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的障碍及化解

◎ 李振武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合作推动了双方实力的壮大，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并不是双方一拍即合的结果，而是通过各自努力和妥协，不断克服诸多障碍的结果。学界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的研究已有很扎实的成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进入到题无剩义的境地了。本文只能是借用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①，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及其破解情况再做一简单梳理，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中共对与国民党合作认识的变化

中共成立后，对与其他政治势力进行合作，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从坚决拒绝到慢慢接受的变化过程。

1921年中共刚成立时，并没有与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联合的意识，更不用说有明确与国民党合作的设想了。虽然当时只有区区50余人，但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强烈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中共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则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提出“中国共产

^①本文在叙述国共合作达成过程时，对以往的研究著述多有参考借鉴，尤其是陈廉所著《第一次国共合作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恕未能一一注出，在此表示感谢。

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②。“对现有其他政党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各种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③。

参与中共创建并出席了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他通过对中共实力的观察以及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接触，很快就萌生了让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1922年4月，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对国民党作了高度肯定，提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④。马林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共只是一个小团体，“只能非法地进行工作，所以，没有显著的成就，与中国南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没有接触”，“只要他们不愿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是暗淡的”。^⑤

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的强烈抵制。陈独秀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六点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各省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⑥

1922年6月15日，中共根据远东民族大会的精神及直奉战争后中国的政治情势、各阶级动向，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⑦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主张。

在此期间，陈独秀、张国焘、苏俄代表达林到广州，召开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达林提出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⑧陈独秀报告了国共关系问题。林伯渠表示支持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国共合作，来自广东党组织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批评孙中山，主张支持陈炯明。因为纷争，会议最终未能达成确切结论。

1922年7月间召开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指出“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

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8页。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组织选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21页。

⑤同上，第15—21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31—32页。

⑦同上，第37、45、46页。

⑧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具体方法是：（一）“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二）“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三）“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决议案特别强调在联合战线中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在多处提到，联合、援助民主派“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无产阶级政党要将革命力量集合在“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反帝反封建）战争”，“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⑨

中共二大改变了一大会议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中共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上的一大跃进。

会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两党合作问题。

陈炯明“六一六”兵变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公开谴责陈炯明，并强令支持陈炯明的广东支部负责人立即改变立场，还给了陈公博、谭植棠等以处分。中共为什么这样做？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教授给出的解释是：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⑩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内称：“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坚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渴望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在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以及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主张。”“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⑪

共产国际8月指示的精神，明确批准了马林“党内合作”的倡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组织，进行活动，但同时必须保持自己完全的独立性。

根据马林的提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提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此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他的理由是：第一，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族民主革命，不能有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无产阶级力量、作用还很小；第二，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最有力量民族民主革命党，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政党；第三，孙中山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须学习共产国际推行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以建立联合战线的经验；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以谋求革命势力的团结，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由国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将其从国民党手中夺过来。

讨论时，张国焘、蔡和森反对马林主张，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加入无异是混合，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65、66页。

^⑩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⑪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65页。

会丧失独立性，主张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组织一个联合战线委员会，可推孙中山为主席。除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广大工人农民以壮大自己力量。陈独秀也反对马林主张，但当马林说明这是共产国际既定决策后，他表示只有孙中山取消加入国民党须打指模及宣誓服从孙中山的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才能加入进去。李大钊支持马林，认为党外合作的联合战线不易实行，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他向与会人员解释，说明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加入国民党可成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既定政策，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会议未以文字而以谅解形式，原则确定接受共产国际提议。^⑫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对马林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⑬。

会议前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拜访了陈炯明兵变后避居上海的孙中山。9月，陈、李等加入了国民党。

中共西湖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加入国民党，揭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它标志着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政策上的又一次变更，意义重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程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马林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它包括一切，如在国民革命之外去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脆弱的，至少5年内中国不会有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共产党，而国民党却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内集合了中国优秀分子，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按民主方式改组等条件，应老老实实，服从纪律，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蔡和森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但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会丧失独立性，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及工人运动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后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认为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独立的运动，而不能成为国民党领导的职工运动，不能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⑭大会通过的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因目前“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议决案最后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组织，从事经济及政治的争斗。”^⑮

^⑫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1年，第235、238、241-245页。

^⑬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394页。

^⑭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46-148、165页。

在共产国际推动、督促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正式确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前，中共曾有过三次非常重要的政策性转变，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中共一大提出的排斥其他一切政党团体到中共二大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第二次是从中共二大提出的“党外联合”到西湖会议勉强接受“党内合作”的转变，第三次是从西湖会议提出的少数党员（不包括工人党员）加入国民党到中共三大确立的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转变。经过前后三次政策的转变之后，中共在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问题上逐步形成较为正确、积极的观点，并将其运用到实践当中，及时纠正一些工作上的偏差，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达成贡献了重要力量。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很快就克服内部纷争，走上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道路了呢？

一是由于当时中共刚刚成立，自身力量和社会影响确实还十分弱小，不足以独自承担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必须寻找联合力量。中共召开一大时，全国有 50 多名党员，二大时有 195 名，三大时也只有 420 名，因而在数量和规模上，中国共产党是无法与同时期的国民党是相比的。1923 年 2 月，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 1922 年 1 月开始的工人运动高潮很快低落下去。“二七”惨案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革命任务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难以完成的，“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⑩。工人阶级应赶快“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⑪。中共开始酝酿同社会上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⑫

二是共产国际的督促、指导、甚至是命令。中共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且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为什么热衷于促成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呢？主要是因为新生的苏俄政权在实施“东方战略”以谋求突破帝国主义列强的封锁包围困境的过程中，认为中共力量太过弱小，不能成为其在中国可以依靠的强大盟友，这一点可以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对中共的评议以及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中清晰地观察出来。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直认为中共势力太弱小，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 250 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⑬列宁也曾称赞国民党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

^⑩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 130 页。

^⑪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1923 年 2 月 7 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 册，1979 年，第 388—389 页。

^⑫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645 页。

^⑬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 1923 年 5 月 15 日至 31 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第 190—191、196 页。

民主革命”^{②③}。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指出：“如果说在西方，在有组织地积蓄革命力量的过渡时期，提出过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现在，在殖民地东方，就必须提出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之所以适宜，是由于要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漫长而持久的斗争，而这种情势要求把一切革命因素动员起来。”为此，工人运动“首先应在整个反帝战线中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因素，……而且有必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妥协”^{②④}。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则更明确地指出：“一、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三、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②⑤}

苏俄、共产国际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思想和干部等各个方面的帮助，而且在指导、促成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达成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三是孙中山晚年在民主革命道路上的不懈探索以及思想认识上的提高，令中共对他领导下的国民党持更多正面的看法。如中共曾多次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②⑥}当1922年1月由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民族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时，列宁询问中共代表张国焘中共是否可以和国民党合作，张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问题，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②⑦}

二、孙中山对与苏俄合作态度的变化

联共就要先联俄，联俄是国民党与中共能实现联合的前提。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确立联俄的政策，有一个转变立场、统一思想的过程。这其中孙中山的态度起了决定作用。

在苏俄最初与孙中山接触时，孙中山对苏俄和共产国际伸出的橄榄枝并没有积极回应。1920年11月间，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面，这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当面接触。在谈到怎样才能把“中国南方斗争，同遥远的俄罗斯的斗争结合起来”时，孙中山表示虽然想与苏俄联系，但抱怨广州所处位置难以实行，只建议在海参崴或满洲设置大功率无线电台与广州联系^{②⑧}。次年12月，马林应邀到桂林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明确表示，在北伐胜利之前与苏俄建立联系会招致列强干涉，待北伐取得胜利后，他会提议与苏俄建立公开联盟。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心态表露明显。在桂林，

^{②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

^{②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2、73页。

^{②⑤}同上，第76页。

^{②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21页。

^{②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98页。

^{②⑧}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317页。

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却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⑥。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对马林的翻译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⑦1922年4月，达林在广州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表示香港就在旁边，如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必将采取行动反他，待北伐军占领汉口时，再谈承认苏俄、与苏俄结成联盟问题。

1922年6月，陈炯明“六一六”兵变发生后，孙中山离粤赴沪，9月18日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言：“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数。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陈炯明兵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以往长期的革命生涯里，孙中山一直寄希望于能从列强那里得到支持，但一直未能如愿，尤其是当兵变事件发生后，英国不但援助陈炯明，还以白鹅潭是通商口岸和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要求支持孙中山的舰队驶离白鹅潭，要孙中山离粤。美国政府口头答应支援孙中山，实则支持陈炯明。真正支持孙中山的，只有苏俄政府。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达林，在孙中山被困在广州军舰上时，即通过孙中山密友陈友仁转达慰问之意，祝愿他斗争成功。^⑧离行时，又转告孙中山“尽管有此次令人惋惜的事件，我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深信不疑”。孙中山通过陈友仁转告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又说：“倘我不得赴苏俄，……将于此地斗争下去终此一生。但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⑨列强的绝情和苏俄的热情，令处于事业低谷的孙中山加快了向苏俄靠拢的脚步。

孙中山到上海后，1922年8月，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特使越飞立即派马林代表他携函与孙中山会晤，秘密商讨以俄为师、苏俄帮助中国革命的问题。

就这样，在苏俄的主动联络下，孙中山转变了思想观念，由幻想英美支持，转而联俄。在与英国记者阿瑟·索兰姆的谈话中，孙中山沉痛地描述了他的转变过程与处境：“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它们站在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的时候就抓住了它。英国和美国站在岸上向我大喊，叫我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帮助我吗？不。……我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⑩在这种处境和心情支配下，孙中山与越飞建立了联系，进行了秘密谈判。

8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大钊与林伯渠一起会见了刚到上海不久的孙中山。李痛陈时局之险恶，表示愿与孙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孙对李极为钦佩，希望他能加入国民党。经过李大钊、陈独秀、马林等与孙中山交谈，孙中山充分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⑪。他明确表示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和作。当李大钊坦率告诉他自己是第三国际

^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72页。

^⑦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年2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373页。

^⑧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4页。

^⑨同上，第126页。

^⑩ [英] 珍尼·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8页。

^⑪《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109页。

的党员时，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②

9月4日，中共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一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1923年1月，苏联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会见。经过几次谈判，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言的发表，表明孙中山开始消除对美英等国的幻想，把注意力转到依靠苏俄。随着联俄方针的确定，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日益密切，并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促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因素、背景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陈炯明的叛变。陈的背叛是对孙中山的一次沉重打击。该事件让他认识到，国民党仅靠主义、道义及本人声望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原则是不够的，必须健全组织，严密纪律。必须努力宣传，使国人和党员明了主义。必须有一支真正为主义奋斗的党军。

再则，苏俄革命的成功，强有力地吸引着孙中山，他决心以俄为师，改造国民党。“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③当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时，苏俄政府的代表达林、越飞等，向他伸出同情、支持、援助之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公开谴责了陈炯明，在道义上支持孙中山，而且发表文章帮助他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使之找到正确方向。从共产党人身上，他看到国民党的不足，决心改组。

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出现的持续13个月之久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30万人以上。特别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给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佩孚以沉重打击。这一形势使孙中山看到工人力量，影响他从依靠军阀打军阀，转变为依靠民众进行国民革命。他决心改组国民党，向民众敞开党门，吸收新生力量，扩大党的势力。

罗家伦主编的《革命文献》对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改组国民党的过程及原因有明确的记述：“陈炯明叛变，总理蒙难广州，北伐之师折回受挫，总理于八月十四日偕同志抵上海，筹划革命大计，审察当时国际之局势，本党失败之症结，国内青年思想之变动，与民众对于政治改革之要求，八月间苏俄代表越飞亦派员来沪晋谒，商讨中俄新关系，遂下改组本党之决心。”^④

孙中山从被动到主动向苏俄靠拢，有一段犹豫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正是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处于低谷时期。生存环境的突然恶化，是孙中山转向“联俄”的主因。可以说孙中山“联俄”，既是为现实困境所迫而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应对策略，同时又是他不断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思想认识日渐升华的结果。

三、国民党内部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及孙中山等的应对

在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策略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一些党内同志的阻挠和非议。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83页。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辑，1956年初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经售，1978年影印本，总第1039页。

对苏俄支持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攻击共产党替国民党起草政纲，阴谋瓦解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改组。他们攻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语”，并将其写进宣言，制为政纲，宣示世界，如此“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上书中还说：“我党对于军阀之攻击，只限于曹锟、吴佩孚。今陈独秀替我党立宣言，则连及于张作霖、段祺瑞，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故此次改组，陈独秀实欲藉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党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⑤

12月3日，孙中山在呈文上批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对于联俄的原因，孙中山解释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对于邓泽如等人提到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批评的言词，孙中山解释说：“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其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谕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吾党。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陈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⑥

正常的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在彼此承认对方独立性的前提下，谋求共同利益的合作，彼此间既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又应享有相应的权益。但从孙中山的此番批语中，却只能明显地看出，孙中山的“容共”是有条件的，即共产党要“与吾党一致动作”，“服从吾党”，这显然不是两个政党间的正常、平等的合作关系。

为了打消党内同志对“联俄”“容共”策略的疑虑，孙中山力图从解释其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方面着手。1924年1月21日，他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做民生主义的说明时说：“本党多数同志对此重要主义，向不甚留心研究，故近日因此主义而生误会，因误会而生怀疑，因怀疑而生暗潮，刻既有此现象，恐兆将来分裂，发生不良结果。故本总理对于此主义，必须再行剖解，庶几本党同志因此主义发生之误会、怀疑、暗潮，可以完全打破，而成一最有力量之国民党。”^⑦“本党全体同志现在思想可分两种：一属于老同志，一属于新同志。老同志为稳健思想，新同志为猛进思想；稳健者可说是不及，猛进者可说是太过。其实过与不及之两种思想，均未明白民生主义之真谛。”“本总理前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

^⑤同上，第9辑，总第1271-1272页。

^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458-459页。

^⑦《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0页。

真谛，双方均属误解。譬如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后，俄人对之，便极力称赞国民党新主张之三民主义，故彼党遂悉心研究三民主义，认定救国大计，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为国民党。本党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碍[疑]。盖恐本党名义被彼利用。对于此事，怀疑尤甚者为海外同志。本总理曾接到海外华侨数次函电，询问此次改组，是否为[改]国民党为共产党？如改成共产党，则华侨同志决不赞成。盖华侨处于帝国主义政府管辖之下，深受帝国主义国家宣传破坏俄国革命论调之毒，故发生种种怀疑，不能自释。”“俄国既为各国所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为海外同志所宜放心者也。”^{③⑧}“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③⑨}“至共产主义之实行，并非创自俄国，我国数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已经实行，且其功效较俄国尤大。”^{④①}

1924年1月28日，国民党一大开议《中国国民党章程（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第二次修正案，广州代表方瑞麟发言，略谓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一条文。此案明显是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事，用意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加入则须脱离共产党。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跨党形式，应明文规定禁止。由此引起激烈争论。

共产党员、审查委员李大钊对对方的发言逐一进行了辩驳。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政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又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第三）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而且“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最后，李大钊郑重声明：“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④②}

李大钊的发言，态度诚恳，言之有理、有据，博得大多数代表同情、赞成，主席团成员叶楚伦、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先后发言支持李大钊。廖仲恺即谓：本席反对方君提案，吾人要问我党是不是国民党，是否有主义、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此外即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的，不是来拖累我们的。胡汉民说：大家的议论，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现在

^{③⑧}同上，第111页。

^{③⑨}同上，第112页。

^{④①}同上。

^{④②}《革命文献》第9辑，总第1243—1246页。

纪律已订有专章，似不必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最后付表决：“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大多数举手赞成，通过。^{④2}

国民党一大不久，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数十人集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准备了警告书，警告李大钊不得“攘窃国民党党统”。警告书尚未发出，廖仲恺、李大钊、鲍罗廷等已向孙中山指名控告刘成禺、谢英伯、徐清和、冯自由四人，称他们不守党员纪律挑拨国共感情。孙中山召集四人到大本营讯问，严厉斥责他们反对改组国民党、扶助农工与实施联俄联共的三大革命政策。据冯自由忆述：“2月16日之夜，弟等奉召赴大本营时，公且声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之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革除党籍及枪毙’等语。”^{④3}冯自由等人其后被迫写书面检讨进呈孙中山，孙中山阅后于3月1日致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告各同志，刘成禺、冯自由、徐和清、谢英伯四人之解释，本总理已甚满足，此事当作作了息。但望同志以后不得再起暗潮。如有怀疑，当来直问总理为是。”^{④4}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右派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弹劾书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案及宣言》（1923年8月25日刊）、《团刊第七号》（即扩大执行委员会特号，1924年4月11日刊行）等印刷品为证据，指责“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认为绝对不宜党中有党”，“非速求根本解决，不足以维持本党之存在及发展”，“希从速处分”。^{④5}企图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限制共产党人的行动。

继张继、谢持之后，“检举”、“弹劾”共产党的风气在各地蔓延，北京、上海、澳门都有人提出类似弹劾案，要求开除“跨党”分子，取消共产党，制裁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弹劾”之风，令两党关系陷入紧张。

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认为对此事应有表示态度之宣言，并呈请孙中山决定。7月7日，国民党发表党务宣言，声明容纳共产党人的原则。宣言中指出：“数月以来，党内党外多有误会。以为已加入本党之共产派党人，其言论行动尚有分道而驰之倾向。于是反动派得借此而肆其挑拨，同志间遂由怀疑而发生隔阂。社会群众之莫明真相者，更觉无所适从，减少其对革命运动之同情及赞助。此种情状，若不亟事矫正及补救，恐直接影响于党务之进行者，亦间接影响于全民革命之发展，关系实至深且巨。”“本党即负有中国革命之使命，即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故对于规范党员，不问其平日属何派，惟以其言论行动能否一依本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如有违背者，本党必予以严重之制裁，以整肃纪律。”^{④6}

8月15至23日，国民党中央一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重点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在19日

^{④2}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广州市委员会、广东革命博物馆、广东人民出版社合编《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1984年。

^{④3} 《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④4} 《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8页。

^{④5} 《革命文献》第9辑，总第1284—1285页。

^{④6} 萧继宗主编：《革命文献》第69辑，第97—98页。转引自桑兵主编、敖光旭著《孙中山史事编年》第10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5511—5512页。

的会议上，张继列举案中所列事实，说明共产党派在国民党中从事党团活动，“革命党人应有自尊之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主张“以分立为要”。委员覃振支持张继立场，主张国民党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同时，须在组织上确定，凡关于第三国际及本党共产派之一切任务，均由本委员会为中心，以期共济，“庶几成为有实力有系统之进行”。中共党员瞿秋白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身份，针对“弹劾案”中最核心的中共党团问题，进行了辩解。他说所谓党团作用，即加入本党的党员、团员一致行动。既准跨党，党外有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且既为之派，则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等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纪律治之，否则只有取决于跨党之决议。若此次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⑧8月21日，全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两个决议案，前者决定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与国民党有关的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后者规定，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党章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在自然的阶级斗争中涌现出的政治组织，既如此，则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故本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符合于国民党政纲，而不问其他。”^⑨

孙中山在会议结束前最后发言，在说明容共政策有时势之需要后，对张继进行了批评、劝导，说：“希望你让我试一试这个既定政策，如果失败了，再请你来主持党务，如何？”张继当场抗辩说：“请遵总理之命，从明天起，我自动停止党权，暂时不问党务，以免总理增加困扰。”^⑩“弹劾案”风波自此暂告平息。

汪精卫后来也向报界谈及孙中山与张继争辩的情况：“总理谓李大钊加入本党，系张继介绍；当时张继明知李大钊为共产党，反以介绍，及今日何以反对？张继遂向总理引咎，请辞去监察委员职务，总理谓，此次会议，纯为告诫，不处罚一人，故辞职可不必。”^⑪

四、孙中山极力维持国共合作的原因

在国共合作的进程中，波折不断。一方面，孙中山对国民党右派阻挠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进行过尖锐批评，如他曾对极力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右派分子，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⑫。对于反对改组最为激烈的冯自由，孙中山甚至开除了他的党籍。另一方面，他对一些共产党员由衷地佩服，甚至与其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如李大钊。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倚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⑬同时，孙中山坚决维护

^⑧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6册，台北财团法人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年，第4734-4735页。

^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中华书局1960年，第368页。

^⑩王成圣：《中国珍闻》，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8年，第51-52页。

^⑪汪精卫：《关于执行委员人数之重要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

^⑫何香凝：《我的记忆》，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7-938页。

^⑬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国民党的利益和形象，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他曾对马林愤怒地表示：“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⑤③}他还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⑤④}

透过孙中山的这些矛盾表态，我们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极力维持与苏俄、中共的这种合作关系，有着比较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他自身的周密考量。

其一，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的事业深陷困境，在向列强各国求助遭拒后，他决定师从苏俄，联合苏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苏俄可以给予他财力、武器、军事政治顾问等方面的援助。而联俄首先就要联共，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中国代表了共产国际、列宁、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苏俄政府代表，他们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意思。联共是联俄的具体表现，只有联共才能取得苏俄的信任和支持。苏俄在人力与物力上对国民党的巨大援助，坚定了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决心；而与苏俄结盟的意愿促使国民党加快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说，“联共”更多的是为了“联俄”，换言之，倘若没有《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达成的有关中俄两党合作的一致意见，国共两党是否能达成合作将是一个未知数。

其二，通过接触观察，孙中山认识到年轻的共产党虽然人数少，但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干劲，这些都是改造精神涣散、缺少活力的国民党所迫切需要的。只有吸收共产党人，将工农力量充实到自己的力量中，才能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当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后，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孙回答说，国民党可比作是一个就要死的人，国共两党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国民党的血液的流动。对此有学者解释到：在革命事业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的革命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⑤⑤}特别是到1924年底，他已注意到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上海各区分部执行委员石克士等对共产党持异议者，称：“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⑤⑥}

其三，长期的革命经历造就的领袖地位，令孙中山对自己的革命理论和权威地位高度自信，对自己的党也有高度自信，认为一切革命力量都应归于国民党的麾下。孙中山向来自信地把自己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是先知先觉者，他的为数不多的长期追随其左右的亲密战友是后知后觉者，占人口

^{⑤③}《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94页。

^{⑤④}同上。

^{⑤⑤}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⑥}《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7页。

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则是不知不觉者，要等着他这个“革命圣人”去开导、去引领。孙中山认为“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革命的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中国共产党“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⑤7}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发出致全党同志书，勉励党员精诚团结，勿再非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事。强调：“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俱在，复按可知。”“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加入本党，在前年陈炯明叛变，本党经一度顿挫后，彼等认为共同革命，非有极大之结合，事不克举，故欣然同趋一致，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彼此既志同道合，则团体以内无新旧分子之别。在党言党，唯有视能否为本党、为主义负责奋斗而定其优劣耳。”^{⑤8}为了消除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孙中山曾多次做解释说明工作，如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的第二天，他就专门发表民生主义的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⑤9}

其四，与孙中山对党的功能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像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⑥0}

国共第一次合作没有有效的合作机制。共产党方面靠组织纪律和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压力等因素来维持这一合作，国民党方面则是主要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来推行。所以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各种反共活动接连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一次基础并不十分牢固的策略性合作。^{⑥1}

（李振武，《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研究员）

^{⑤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7页。

^{⑤8} 《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42页。

^{⑤9}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9-390页。

^{⑥0} 杨奎松：《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考虑》，《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